

文学的重点不是故事

——关于余华小说《河边的错误》

■ 桑克

“没有答案，不如发疯”。这和小说倒是一致的。小说也没有答案，只不过小说中的发疯只是为了给警察马哲打掩护的权宜之计。

没有真相，只有事实。这是小说也有的东西，但在电影里变得异常突出。余华自己也说：“对创作而言，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存在的只是事实。”余华说到做到。有逻辑的事实和无逻辑的事实，读者都不应该陌生。所谓无逻辑可能只是逻辑藏得太深没被发现。

还有一个小观察，即在形态相似度趋于极端之地，真相往往被遮蔽得异常严实。电影里的大波浪不仅为女工们所有，也为马哲妻子所有，但是心细若发的马哲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个。在这种极度相似的村镇环境之中，真正的个性往往呈现为癫狂或者怪异，比如疯子，比如许亮，比如相互抒情的女会计和王宏——以诗表达是近年严肃电影的一种追求，正如魏书钧没有忘了把刑警大队的办公地点放在一个荒废的电影院里，以此彰显他对电影的特殊感情。

读者的初始目的可能就是一个警察的目的，试图在纷纷攘攘的表象之中找出真相的完整拼图，而聪明的比利时人波洛仅仅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微妙勾连就能描绘出一个集体谋杀案。马哲办不到。

而且仅凭推理这一点达到目的，余华本人也不同意。

文学的重点不是故事。余华写事实写表象的本事让人心生敬佩，而且看着看着就会发现案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陆陆续续出现的市井人物，而且一个比一个怪。

第一个受害者是幺四婆婆。这个名字当然不是特意要与要死婆婆谐音。她与疯子的关系非常诡异，仿佛母子（社会层面）又仿佛夫妻（家庭层面），而且是丈夫家暴妻子的类型。同时这也为疯子的暴力属性提供了一条鲜明的证据。

其他人物更怪，比如王宏，比如许亮。但是让我感兴趣的却不是这些人物的怪，而是他们异常突出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我甚至认为余华这部中篇小说的文学贡献就在于此。

《河边的错误》开头写孩子的文学性还不是很明显，但是端倪已经显露出来。比如孩子告诉父亲他发现了河边的人头，结果父亲却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告诉母亲，母亲让他别乱说。这时候，“孩子不由得悲伤起来”。这种小地方才是值得关注的。如果再看看余华的《现实一种》，再看看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读者大概就能明白什么是文学了。

孩子之后告诉“比他稍大一点的孩子”，让他们领他们去看。

“他认真地点点头，因为他的话被别人相信了，所以他显得很激动。”由此读者看到一个渴望被信任的孩子，一个渴望被重视的孩子。当然他之后也有点儿讨厌，跟聪明的小谢尔顿一样。

余华笔下的人都像活的，都像呼哧呼哧在你耳朵边喘气的。王宏讨厌马哲他们这些警察，他的理由是“你们谁都怀疑”。王宏从不觉得自己片面，从不觉得自己有局限性，反而有一种真理在手别人无知的小悲哀。许亮则是余华在《河边的错误》里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人物。“邻居说他很孤僻，单位的同事却说他很开朗。有关他的介绍，让马哲觉得是在说两个毫不相干的人。”邻居说的是事实，同事说的也是事实，但在马哲看来两种事实不兼容。这正是马哲的认知局限。人是有多面性的。就这么简单。

许亮的语言方式与思维方式听起来超级怪——

“你刚才说是熟人，可又记不起了是谁了。”马哲微微一笑。

“这是很正常的。”他说，“比如你写字时往往会写不出一个你最熟悉的字。”说完他颇有些得意地望着马哲。

这么看，许亮才是一个正常的哲学家。马哲想从他这里找到真相几乎不可能。类似的经典段落

应该包括丢失发卡的语无伦次女孩与马哲的对话，其精彩程度堪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再比如第二个受害人的新婚妻子，她与马哲素不相识，但却执着地认为马哲应该参加他们的婚礼，应该知道他们的各种事情。此外，还有一个人的语言方式值得注意，那就是发现许亮自杀的朋友。他对许亮的描述具有一种异常荒诞的朴素感。

马哲用手一指，请他重新在椅子上坐下，随后问：“你认识许亮多久了？”

“不知道。”他恼火地说。“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他说，“但问题是这很麻烦，因为要回忆，而回忆实在太麻烦。”

图省事可以认为小说人物全是正常的疯子。电影里的许亮气息比较接近原著，但是又不同。小说里的许亮与案件并无关系，他如此言说又似乎让人误以为他与案件有关——

他朝马哲狡猾地笑笑。“我知道你们始终没有放弃对我的怀疑。我觉得你们真正怀疑的不是疯子，而是我。你们那么做无非是想让我放松警惕。”他脸上又出现了得意的神色，仿佛看破了马哲的心事。

应该重点研究许亮，但我就此打住。余华说：“艺术家只能来自于无知，又回到无知之中。”知道什么就写什么。真相扑朔迷离，那么扑朔迷离就是真相。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推理只能放在推理之中，推理永远不是事实，事实似乎只有肉眼看见的这一部分。

历史与私情

——读杨怡芬《海上繁花》

■ 方 岩



中后的漂浮过程中，船上日军转移到赶来救援的军舰上，对战俘却不予营救，甚至封堵了舱口。10月2日船沉之际，当战俘突破封堵后，日军又开始枪击在海上逃生的战俘。与此同时，舟山的渔民们开始自发抢救落水战俘，共救起384人。这些战俘大部分于次日被日军重新捕获，只有三人在渔民的掩护下被送往战后后方。这1800余名战俘中，800余名于当日丧生海底，300余人死于运输途中和日本战俘集中营的饥饿、疾病、虐待和恶劣环境，700余人幸存至战后回其母国。时隔81年之后，舟山本土作家杨怡芬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于是便有了长篇小说《海上繁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

重新讲述一个真实发生的历史惨剧对作家来说是一种写作伦理上的考验。在细节渲染、抒情调性、议论立场、叙事节奏和侧重点等层面的失衡，或者会让历史叙述陷入猎奇的消费主义陷阱，或者沾染上狭隘而肤浅的民族主义情绪。于是，杨怡芬决定让更多的声音加入历史重述。在叙述者“我”占据了大量史料后所铺展的相对开阔、冷峻的历史语境之中，战俘（伊恩等人）、难民（敏妮等人）、渔民（阿卷等人）、日军押送人员（荒木）等人的视角交织出复杂的故事形态。所以，《海上繁花》以历史惨剧为叙事起点，编织出一幅壮阔、斑斓的历史图卷。比如，伊恩不仅是“里斯本丸”惨剧的亲历者，其身份、经历（战前是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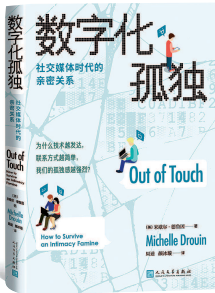
商人，战时则为守城士兵）的变化过程，其实是香港二战前后社会图景变迁的缩影。他在舟山群岛上见证了封闭世界中朴素而恒常的人性，与之相对应的是战乱世界中的罪恶与丑行；他在被秘密押送去重庆的路上，成为沦陷区、国统区种种社会状况的观察者和实录者，更是成为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纠缠、防备、合作的秘密守护者。所以，丰富而充沛的历史信息使得《海上繁花》不只是关于历史惨剧的悲悯叙述，更是关于历史、人性、政治复杂关系的深刻反思和深情回望。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楔子”部分，主要讲述的是叙述者“我”与日本女子香织的爱情故事。从形式上讲，这是一个可以独自成章的温暖而细腻的情感故事。“楔子”营造了某种安稳、平静的现实感，它插入、中断历史叙述，不仅是为了调节叙述节奏和氛围，让读者不时地从一段压抑、残酷的悲情中抽身而出从而形成某种必要的审视距离；其实更是实现了历史与私情的某种关联和对话。当香织的奶奶坦诚地说出自己的丈夫曾经作为日军伤病员搭乘过“里斯本丸”时，我们便会明白：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正视，历史的幽灵其实一直盘踞在我们的日常之中。我们坦荡地谈论它，并不只是为了疗伤与和解，更是为了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即将展开的未来。可以说，杨怡芬关于“楔子”的匠心设计，又赋予了《海上繁花》一种辽阔而深沉的历史前瞻意识。

今天，当我们说出“人际关系”这个词时，必须自问，指的到底是“人际关系”还是“人机关系”？随着智能手机在生活中的普及，人际关系迎来最好的时代，也进入最坏的时代。因为手机带来的广泛、迅捷的连接，我们得以和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建立联系，并由此进入更丰富的世界；同样，因为手机的介入，使关于人际关系的一切古老词汇，诸如友情、约会、爱情、婚姻，都在接受改造，甚至变得面目全非，“人际关系”正在变为“人机关系”。那么，在这个人机共处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生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书《数字化孤独：社交时代的亲密关系》提供了一份简明教程。

这本书的作者米歇尔·德鲁因自述，在过去的十年里，她一直关注科技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尤其是社交媒体如何扰乱家庭和工作场景中的互动，以及对手机和社交媒体的依赖给人际关系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这本书正是她长期实证研究的成果之一，不过，此书对于非专业读者十分友好，全书分疫情、童年、友情、网络、约会、婚姻、老年六章，开列了操作性“生存指南”，作者和译者的文笔都十分流畅，把专业的心理学知识转化为了通俗的语言，同时又善于运用有效的论据，雄辩而不失共情地说明自己的观点。

比如，在“童年生存指南”中，作者一方面揭露，创造了社交媒体的科技巨头、硅谷高管们诸如比尔·盖茨、乔布斯反而限制孩子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禁止儿童使用电子产品的



《数字化孤独》：我们如何自处并与他人连接

■ 胡一峰

学校也更受科技大亨们的青睐，以此告诫读者“如果你想让孩子真正茁壮成长，那就引导他们远离自拍，多做图表。”另一方面，她又指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草原”，如今的孩子从网络生活中获得的社会联系如涓涓细流，让他们和属于他们的时代更妥帖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的孩子确实需要知道如何在当今的世界中使用科技产品，利用好科技可能会帮助他们在事业和社交中取得成功”。

这样的态度无疑是通达的，而这一态度同样贯穿在作者提出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生存指南”之中。比如，在《网络生存指南》里，作者说她永远不会拒绝手机，也不建议别人拒绝手机，但是，当手机开始干扰生活，而不是帮助主人活得更好时，就必须作出改变，诸如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如晚餐时）或者亲密的空间（如晚上和伴侣共度睡眠时光）里禁用手机。说到底，作者所希望的，其实是在人机共处的时代，反思并重新确立人的主体性。有了这种主体性，就不惮于使用网络给自己多一份机会；在真实世界里缺乏需要的支持时，也就会毫不犹豫地到网上寻找可以联系的人，即便你已进入老年，受困于疾病和健康危机，借助在线论坛等平台面临相同问题的人分享痛苦和快乐，“幸好我并不孤单”的自我安慰本身就是一剂心理良药。

现代人是生而孤独的，却无时无刻不在网络之中。翻翻这本有趣的书吧，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社交网络，为了找回免于孤独的自由。